

永康文史

(第三辑)

1986

目 录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编辑：永康县政协

印刷：永康印刷厂

日期：1986年7月20日

封面题字：章寿松

封面照片：寿山瀑布

· 旧史往闻 ·

- 抗战期间的浙江省临时省会——方岩……吴益逊(1)
抗战期间在方岩的浙江省政府……沈松林(3)
我在方岩省府秘书时记忆到的几件事……黄昌元(8)
浙江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永康下园朱召
开的五次会议的一些情况……以道整理(9)
国大代表应征其人其事……显群(14)

· 英烈颂 ·

- 祭英烈，忆当年——扫墓有感……何渊(16)
回忆张贵卿同志在狱中……程绍庭(19)

· 时代足迹 ·

- 永康战时政工队的情况……胡春容(23)
五峰学会简史……朱观成 潘钧(29)
追记抗战时期的永康地下党活动……胡岩岁 胡济涛(33)
一段难忘的回忆……胡济涛(38)
狱中结识方志敏……胡逸民(40)
永康第一个职业学校的创始人——胡钦海……潘钧(45)

· 史海拾贝 ·

- 永康医籍录……中医学会(47)
医林人物志……中医学会(48)
民国永康县新志稿卷三、七、八摘录……(50)
1862—1945年永康稻谷价格……(53)
国民党永康县党部之演变情况……寿秀群(54)
三青团永康分团之演变情况……施蒋程(57)
“两统”组织在永康概况……献文(60)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永康分会始末……葩民(65)
民国时期永康县参议会第一、二届参议员
名单……本刊辑(66)

· 社会一隅 ·

- 民国时期永康县佛教分(支)会组织概况……施高寿(69)

· 文物保护 ·

- 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文管会(70)

· 来函选登 ·

抗战期间的浙江省临时省会——方岩

吴益逊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八·一三”上海战役，国民党军队阻击日军于淞沪战场；十一月初，日军在杭州湾全公亭登陆，致淞沪抗日部队腹背受敌，撤离淞沪。浙江省会杭州，形势危急。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于十月末开始撤离，先驻金华，年底移驻永康之方岩，作为临时省会，时达四年。我是身历者。但因囿于职司，闻见不广；仅就所知，记忆概略。虽一鳞半爪，要在存实，供后之治史者参考。

初迁方岩

方岩本为名胜之区；岩下街旅店栉比，可供千人住宿。寿山坑五峰书院洞容广阔，房舍完整。省府所属秘书处、会计处、卫生处，民、财、教三厅，高等法院，警察大队，先后迁驻。即以五峰书院、岩下街、与附近橙麓村、派溪一带，作办公室及安排员工家属住处。当地居民在全民抗战精神鼓舞下，一应让房，供应生活资料，热情接待，至今回忆，尤足感人肺腑。

四年间的动迁

当时，省政府秘书处驻寿山坑固厚峰下的五峰书院内，财政厅驻寿山坑的兜率

台（胡公家庙），民政厅、教育厅、会计处、卫生处，则租用岩下街民间宅院，高等法院驻方岩山东坡下回龙桥边程氏宗祠。1937年成立省营贸易处，和财政厅一起。1941年成立省田赋管理处，设在方岩汽车站边借用民房。保安处驻金华，建设厅设在丽水。省参议会，浙江地方银行，驻永康城内。

当时，方岩至世雅有公路支线，与浙东公路、浙赣铁路衔接；北可达诸暨以连宁、绍，南可达赣、闽，以通湘、黔。自1938年至1939年一段时期，浙江战局较为稳定；方岩先后设立地方银行办事处、卫生所，解决省金库调拨划汇、及卫生医疗问题。当地居民在五峰路边坡地构筑简易楼房，长松作柱，高者达三层。用以出租解决外来人口居住问题。

1939年底日军占萧山，浙东震动；省府各厅仍驻方岩，部份人员家属曾撤退松阳，旋折回复。1941年初日军陷绍兴，省会各机关全部播迁松阳，于七月间再回方岩。1942年4月，日军沿浙赣路並分由东阳永康进逼金华，南犯衢、处，省会各机关迁往云和，在方岩为期四年。

省会各机关的主政者

省府主席：1937年朱家骅，南迁后黄绍竑接任。

秘书长：李立民。

会计长：张梁任，1938年陈宝麟接任。

民政厅长：王先强；阮毅成继任。

财政厅长：程远帆，1938年黄祖培继任。

教育厅长：许绍棣。

建设厅长：伍廷飏。

保安处长：宣铁吾。

贸易处长：黄祖培兼。

田赋管理处长：黄祖培兼。

高等法院院长：郑文礼。

省府南迁后的几件事

黄绍竑在淞沪撤军，省府播迁的紧急时刻接任浙省府主席。到任之初，奔走呼号，每遇集会，慷慨陈辞，颇思有所作为。但受国民党省党部及三战区牵制。1939年以后，几乎每隔一、二年，即有省府改组的传闻。以下所记，涉及省府及各厅处工作，就事记事留待后人评说。

1、1938年大办抗日自卫队，並在大港头筹设兵工厂，但蒋介石不敢发动群众，不愿地方多拥武力，抗日自卫队终由国军收编。省的武装限于保安六个团。

2、淞沪战后浙西陷敌手，浙西青年学生纷纷奔向浙东。当时在丽水碧湖办起青年工作人员训练团，招收青年作为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又成立联合中学，收容沦陷区撤出的青年学生。浙东局势略定之后，成立英士大学于金华，后移丽水。省政府移云和后，开办行政、财政、会计三个专修科，由民政厅、财政厅、会计处与英大合办，作为三厅处补充人员来源。

3、经济方面，成立油茶棉丝管理处，统一收购桐油、茶叶、棉花、蚕丝四

大特产。

4、1941年后省地方财政由中央统管。这以前省财政是由省自行收支的。初因编练抗日自卫队，需费甚巨，曾在田赋项下附收抗卫经费，此外筹款采取过两项办法：（一）1938年成立卷烟管理处，卷烟在进口、出厂时贴花收费。（二）1939年成立省营贸易处。收购青油、茶叶等土产，出口外销。采购赣锡供给宁绍缫厂。收购浙东火柴厂产品，分点配销。收购沦陷区运入之布匹等短缺物资，供应后方。以盈余作为省库收入。方岩附近的前园曾作茶叶仓库，岩后村东北的方山口曾建立青油、木柴仓库。

5、整顿税收，向各大学招用毕业学生，及公开招收学生，以代替老税吏。查征分权；分区成立查缉办事处，沿边界派驻经济封锁缉私队，招收学生充查缉人员、缉私队警。成立之初，在派溪、南马设短期训练班。1941年省财政由中央接管后，移交中央经管机关接收。

6、黄绍竑在方岩时一年一度的省行政会议，都是在五峰书院举行的。1941年7月由松阳回方岩的一次行政会议，则是到接近沦陷区的嵊县举行的。

往事怀念

1939年三、四月间，周恩来总理曾到方岩。当时国共合作，周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来到金华，在赴绍兴前线视察之前，由黄绍竑陪同来临时省会方岩视察。

寿山坑五峰书院下草坪中央（五峰公园）曾建有抗日纪念碑，不知现存否？

（编者按：该碑现已不存）

1985年10月22日

抗战期间在方岩的浙江省政府

沈松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杭州常有空袭，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于10月间就把大部份机关及人员撤退到金华。不久，黄绍竑再次来浙江主政，他先到杭州与朱家骅办好交接手续，于敌军窜犯杭州的前一个晚上，即12月23日半夜里，黄绍竑过了江，国民党军队随即炸毁了刚建成不久的钱塘江大桥，黄绍竑经过桐庐到金华时，金华已在敌机不断轰炸中，各厅处人员无法办公，乃决定将浙江省政府迁到永康方岩，到1941年5月迁往浙南云和县去，偏安方岩共达四年之久，笔者曾在方岩的浙江省政府工作到1941年冬，

本文所述情节就是那一

段时间内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

（一）浙江省政府各机关在方岩的安排：

浙江省政府设在岩下街西面约两里的“五峰书院”内，那里有五座山峰（鸡鸣、覆釜、桃花、瀑布和固厚）尽是悬崖绝壁，在固厚峰下几个大山洞里，上、下岩石相距两三丈，上面大半截岩石临空，下面都平坦，四边筑墙，装上门窗，风雨吹不进，而且冬暖夏凉。敌机来轰炸时，只听到声音，房屋也不会震动，当然不会被炸塌伤人，真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天然防空

洞。据说“书院”最早是宋代道学家朱熹和吕东莱、陈龙川等人讲学之处，真是既有风光，又多古迹。

浙江省政府各厅处则多分布在岩下街。街道虽不长，房子却不少。特别是祠堂、旅馆，房子都相当大。这里的旅馆建筑特殊，大都有三层，最低一层比街面低，临街的店房都很宽敞。一般房屋二、三十间，甚至有的多达五十间，平时作招待香客之用，战时却可使大批公务人员有安身之处了。楼下照样做生意，楼上作集体宿舍。至于有眷属的就租用民房。一时民间抢建了不少房屋，饮食、理发各种商店以及营造业等一应俱全，其中有少数是从杭州跟着省政府播迁而来的。小小的方岩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面。原有的当地居民以程姓为最多，其次是姓应、姓胡和姓李的，大都聚族而居。

省府各厅处人员相当多，因公去方岩的也不少，再加上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也设在方岩，于是生活资料的供应日益紧张，所幸离岩下街两里远的派溪有定期的“集市”，还可勉强应付。记得省政府初迁方岩时，一元钱可买米25斤或猪肉7斤，或盐10斤。一只20多斤的活羊也只要两元多，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公务员的生活并不象抗战后期那样的艰难。

省政府的各厅处虽然大都放在方岩，但军事部门均设在金华。例如黄绍竑建立的“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军司令部”，他自兼总司令；还有规定兼职的“省保安司令”和“军管区司令”等等，因此他在金华的时间多。此外，他又组织了临时性的“县政检查团”，自兼团长；率领各厅处高级人员30多，奔跑了不少县份。他还常到西天目山的“浙西行署”和临海街头的“浙东行署”去视察，因此种种，他在方

岩的时间并不多。

至于也设在方岩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人数虽比省政府各厅处少些，但也增加些战时组织。省党部主任委员还要与省政府主席常开党政联席会议。尤其在抗战初期，谷正纲当省党部主任时，与黄绍竑时常接触，我在他们会谈时当过记录。省党部职员为了租用民房与生活细事，与省政府人员发生争执也是难免的。

（二）黄绍竑来浙不久就抛出与众不同的施政大纲，即“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动员民众抗战，集训爱国青年等等。当时大家认为那是个进步性的文件，曾轰动一时，这里显然与他来浙江前在北方作战，看到人民的热情，与接触过不少共产党的领导人有关。记得1938年春夏之间，我随他在夜晚赴丽水县大港头去欢送粟裕将军率领的闽浙边区工农红军北上抗战，当黄绍竑对战士们讲话时，粟裕带领战士们高呼“拥护黄主席的十大政治纲领”！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三天后，重庆军统局还来电询问，黄绍竑复电说是共同抗战应有的态度和礼貌。

黄绍竑由于思想比较进步，在对大家讲话时，常强调“抗战第一”，对青年和各级机关的人员不必问他属于那一个党派，只要富有爱国精神，努力抗战工作，谁也不准去找麻烦。当时在各厅（特别是建设厅）有些职员是参加共产党的，他从不过问。至于后来他支持义乌县长吴山民的进步行动以及在各县成立“政工队”，鼓励了无数的青年开展“救亡”工作，其中有很多共产党员，更是人们尽知的事实。黄绍竑为宣传抗战，还先后办过一些战时刊物，如《浙江潮》杂志就相当有名气；还有《浙江日报》和《浙江政治月刊》也别具一格。

（三）浙江省政府在方岩增设了不少经济机构。自从杭州沦陷后，富庶的浙西各县陆续被日寇占据，接着又怕沿海口岸被封锁，人民生活物资更加缺乏，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为搞活经济，开辟财源，黄绍竑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增设了不少的经济机构。比较有成效的有下述几项：

1、普遍设置税务处及其分支机构，加强查缉制度，规定奖金制度和现金存放金库，并动员青年参加征税和查缉工作，不让那些“内行”（主要是指历史上传统的“钱谷师爷”）经管，防止作弊。

2、战时贸易处。当时浙东沿海口岸尚可进出，就按吨位收些“公益费”，同时开展地方营业，包括交通、电讯、谷米运销、合作金融、化学肥料等等的公卖事业。

3、卷烟与火柴公卖处。除征收统税外，另加50%的公卖费。对进口卷烟也收公卖费35%，这几项公卖费在1939年每月可收入40万元。火柴公卖是产品收购后，核定售价，再行出卖。所有公卖事业的收入，在1939年竟达全部岁收入的20.95%，这对当时的财政帮助很大。

4、征收特种消费税。这是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国家的经验而试办的，其范围很广，包括烟、酒、盐、火柴、煤、呢绒、洋布、锡箔等等，一时收入虽然相当可观，但难免发生流弊。

5、油茶棉丝管理处。油茶棉丝一向是浙江的特产，是浙江财政经济的主要支柱，但产地大都在钱塘江北岸，1939年，由国民党中央与浙江省政府联合组成机构，因为不能及时收购，以致偷漏走私之风甚炽，1942年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办理，不久落入“军统”手里，在淳安设立所谓财政部的“货运管理处”（永康人陈庆尚

就是货运管理处的副处长)，浙江省政府就无权过问了。

5、食盐收运处。这个机构初由浙江省政府主办，后与财政部合作，设在方岩的这个特种机构，与上述各个专以征税为主的不同。其目的有二：一是怕将来在钱塘江南岸产盐地区被日寇侵占，民间需要储存大量食盐；二是浙江缺米，江西和有些内地缺盐，以浙盐换赣米，双方有利。当时浙江就用古老的手车从产盐地区把盐运往江西，换米回来，沿途设站，日夜运输，运输队最多时达几千人。后来日寇南窜，钱塘江南岸盐场大都被敌伪占据，虽有个别地区尚可从水道抢运，但为数不多，仅能供民用，对省财政的作用就小了。

增设的财政经济机构，尽管大多是由当时的财政厅长黄祖培和建设厅长伍廷颢（均广西人，是黄绍竑的亲信）分别兼管，但也增加了不少职员。小小的方岩，因此有难于安排之患，何况还有其他的增添单位，例如卫生处、防空指挥部、地方行政人员养成所、警察训练所等等（粮食局早已放在永康城内），同时鉴于宁波已沦陷，日寇随时有南窜的可能，未雨绸缪，浙江省政府就在松阳县设立办事处，调一部份人员在那里办理不甚紧迫的文件，我曾去主持过一段时间，同时还将有职员眷属移居松阳，其他厅处也有类似的措施，还有些办事处设到丽水城里和碧湖镇去，这样才减轻方岩的拥挤情况。

（四）1938年夏末，在方岩曾发生黄绍竑突然辞职未准的一幕。

黄绍竑在抗战初期来浙时，有些措施比较开明、进步，其思想深处，可以从他在杭州沦陷后所填的词句中看出，例如：

“……一步一回头，酒旗楼外楼，吴宫人

已去，教训课生计；期以十五春，还伊湖上人。”那次突然辞职未准的内部消息，使我们一些人甚为惊讶，又不便询问。大家猜测的说法不一。以后才知道当时他接到国民党中央给他的电报说：“浙江省政府声名狼籍”，要他切实注意，他很愤慨，在省政府会议上宣布，但不同意全部委员辞职的建议，而由他个人单独去电辞职。接到复电是“慰留”，说是：“耳有所闻，乃以告。”但他仍觉得不妥，特去汉口向蒋介石当面辞职，仍旧不准，并且安慰他一番，经过那一次的“政治暗潮”，此后，每有重大事件，他就直接报请蒋介石核批。他认为那次事件也许是因为他：“不顾一切，太猛进了；”“与共产党人太接近了。”但他始终没有谈起是谁对他的监视与汇报，旁人虽然心中有数，也只是背后议论而已。

黄绍竑并不因为有过那一次“暗潮”而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仍然公开接触。如在1939年10月底，他从重庆回来，就与周恩来、叶挺同行，到衡阳与叶剑英见面，后来叶挺中途下车，他与周恩来同到丽水大港头，接着到金华。周曾公开与一些人谈话。（当时的《东南日报》上曾登载过这方面的新闻。）后来黄先赴于潜西天目山的“浙西行署”，周赴绍兴后也到西天目山去，这都是公开的事实。黄、周有些“口头约定”，事后国民党中央也查问过，黄复电是主要商谈“共同抗战”而已。

（五）绍兴沦陷后，浙江省政府一度从方岩仓惶撤离的经过：

杭州沦陷后，日寇并未立即渡江南窜，时隔三年在一个冬季下雪天，日寇来一个所谓“白衣渡江”，在萧山与绍兴之间濒江地带向南窜扰。因为那个地段是浙

江地方部队即“国民抗敌自卫军”的防地，力量较薄，遭敌袭击，一触即溃，这是敌军进犯浙东各地的开始。在1941年3月间，黄绍竑带了“县政检查团”三十多人（我兼该团的秘书）从金华专用一节车厢开往诸暨、萧山方向，不到一小时，敌机就从杭州飞来跟踪火车用机枪扫射，黄绍竑立即令我带着各厅处人员下车，他从另一边也下车分别伏在麦田里，火车驰进沿途设置的掩蔽棚内。等敌机去后再前进。曾在萧山何上巛于半夜里召开民众大会，天刚亮，杭州玉皇山上日军的炮弹就飞来了。我们经过枫桥向绍兴去，我与各厅处人员打前站。我一进绍兴城，就跑去问绍兴专员兼军区司令员邢震南，急问“前线有何情况？”他说：“平安无事。”我说在途中曾听到敌军有从宁波向南甯的消息……他似乎笑我太慌张，他说：“日军无动静！”黄绍竑来后（他俩是保定军校的同学）邢殷勤招待，两人谈笑风生。到深夜，我接到方岩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电话说：“已有情报，日军即将从宁波出发向南甯，你们要注意！”我再去找邢震南，他仍说：“平安无事，你们文官胆子太小了！”接着，驻绍兴的八十八军军长莫与硕（黄埔军校一期的）在军部演剧欢迎黄副司令官（黄绍竑兼第三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当夜，我接到李立民的紧急电话：“你们再不离开绍兴，就全要当俘虏了！”我跑到八十八军军部报告黄绍竑，他似乎故作镇静地说：“到天亮，你带大家先去嵊县，我稍迟就走。”我们到嵊县后，已得到确实情报，日军从宁波向南甯了。我们到东阳，就有敌机飞来了，到了方岩黄绍竑立即赴金华去布置军事。我们照常上班，但很快就接到绍兴沦陷的正式信息了。敌机不断狂炸方岩，大家都有敌军

即来之感。一天上午，省政府秘书长接到黄绍竑的电话：“方岩所有机关和人员立即向松阳撤退！”顿时混乱万分，我们急忙商量了一下，决定将所有档案，重要物资，由各厅处以公家的汽车先行送去；一般东西只有集中封存，职员集体撤退，有家属的自行设法，可先离开。我把一些重要事件安排好，就离开五峰书院。到岩下街程家，把眷属带走，所有杂物、书籍以及床上用品都抛弃，仅仅请了两个农民用箩筐挑了孩子，匆匆地离开方岩。其他同事也都仓惶出奔。还有不少人，大都是浙西各地流落到这里来的，也跟着一起逃。经过永康城，走向武义县，敌机竟来低飞扫射，沿途不少人受伤，抛妻弃子，妇女、儿童，一片哭声，惨不忍闻！傍晚到达武义。当时武义城里因被敌机轰炸，发生大火。我找到当地县长，他已惊慌失措，无法安排象潮水般涌来的各机关职员和平民。我全家人就睡在城边破屋内地地上，我相信还有比我更狼狈的。第二天黎明，再向宣平方向走，山路崎岖，隔一天才到松阳。那次从方岩仓惶撤退的惨状，至今记忆犹深。在各厅处撤离方岩后，黄绍竑还特去方岩视察一周，看到卫生机关有遗落的一个药箱，他带走后，对主管人员还批评过。

（六）浙江省政府再返方岩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

浙江省政府人员到达松阳，因原有个办事处，就急急忙忙地开始办公。但各厅处不少职员却被安排到丽水方面去。黄绍竑奔走于松阳与丽水之间。日寇占据绍兴后，没有立即再向南甯。大概相隔一个多月，黄绍竑考虑有回方岩的可能和必要，就命令省政府秘书处先去布置。因此我与另外两个秘书和一个管印信的女职员先回

方岩。那时方岩已是一片凄凉景象。我们将五峰书院和几个主要的办公场所稍稍整理下子，然后各厅处人员陆续返回方岩。但已比撤退前的人员减少很多了。在从松阳返回方岩后，有几件重大事件分述于后。

(1) 在嵊县独秀山上召开前线会议。省府从松阳迁返方岩不久，黄绍竑就到嵊县独秀山上召集前线各县县长和有关人员开了一次会议。主要为安定接近敌军占据地区各级行政人员的情绪，同时检查受敌军流窜的影响，重行布置敌后的任务。会议时间不长，参加人数也不多，会议一切事务指定我负责料理，会议结束后回方岩不久，我又随黄绍竑带了“县政检查团”到浙东与江西、安徽交界的各县跑了一圈。

(2) 因绍兴沦陷的责任问题，黄绍竑与顾祝同在思想上有些隔阂。日寇从宁波偷袭绍兴，事后查明，是由于前线电话总机女接线员当了汉奸，邢震南又太昏聩糊涂，每次得到的都是“前线平安无事”，实际上都是受骗的假话，以致敌军到达绍兴五云门外，城内官民才发觉已被敌人封锁。县长邓仞想冲出去，结果死在敌军机枪之下，连死尸也没有找到。邢震南因随身兵力较多，在伤亡不少的情况下，才勉强冲出。绍兴市民和嵇山中学不少学生们徒手向外冲，被敌军机枪射死的达几百人。绍兴城内所有银行、钱庄、大商家以及富户们的一切都落到敌军手里，其损失之大实难统计。宁波与绍兴同为财阀的家乡，遭此大劫，个个愤怒到极点，事后纷纷要求蒋介石严惩邢震南，因此邢被扣押在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接着那批闹闹和绍兴居民不断地要求蒋介石处以极刑，隔了一段时间，黄绍竑得到邢震南将被处死

刑的消息，连夜从方岩赶赴上饶，想去营救。当他离开方岩后，省政府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第一句话就是“地方官有守土之责……”这显然是想封住黄绍竑之口，秘书长和我们商量后立即派人追去，请黄绍竑不要再争了。邢震南死后，黄绍竑感气愤，提出“地方行政专员已伏法了，难道派驻绍兴的军事专员倒无责任吗？”这显然有些“赌气”意味，后来据说当时的军事专员何嶷也陪死了。这样一来，许多人认为同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顾祝同与黄绍竑之间有隔阂，但也有认为黄绍竑个性太强，因为邢震南实属昏聩，死不足惜。

(3) 召开全省行政会议。浙江省政府于绍兴沦陷后，撤离方岩，曾与各方面的联系一度中断。在省政府仍回方岩后，为了使各项工作能正常进行，实施继续抗战的迫切任务，黄绍竑觉得有召开一次全省性行政会议的必要，于是命我负责筹备。按当时的情况，要各地的行政专员、市、县长和军事机关负责人齐来方岩开会，确不容易。一则是他们能否都离开工作岗位，尤其是沦陷区和接近前线的县份；再则在小小的方岩开大会的条件也难具备，还有安全问题。经研究决定，大会会场放在派溪，出席会议人员以住岩下街和附近小村庄内为主，其随从人员和卫士们，安排在“世雅”到岩下街的一带。至于防空与会议期间的供应问题，也都经过周密考虑并作了充份准备。不久，各地的专员、县长和有关人员纷纷来报到（也有些人限于当地情况特殊，无法参加的）。在开会期间，大家情绪既高涨又紧张，除由黄绍竑和各厅长轮流主持大会外，最后还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到会讲话，他除了一般性的鼓励外，还提出要接受绍兴沦陷（下接第8页）

我在方岩省府任职不到三年，名义是视察，实际坐办公室处理专员、县长被控案件，及人民对行政机关提出诉讼问题，与外界很少接触，对各厅处及方岩整个情况，都不够了解，谨将几件记忆较深事谈谈。

一、方岩是名胜古迹所在，村庄并不小，可是骤然搬入省政府、省党部及各厅处局，房屋就成为极大问题。那时各机关均集中在五峰书院一带，工作人员则大部份赁居在岩下街各旅社和民房，每日要从岩下街步行至五峰书院来回几趟，我们秘书处设在大岩洞内，地点较好，秘书处有四科一室，科长为徐泉、杨可大、潘正球、钟树人等，政工室主任吴寿彭，照编制规定有8名视察，在编制外尚有几个专员，人数不定，也无具体工作。主席黄绍竑长住金华，日常事务归秘书长李立民主持。我原是司法人，因李立民要找法律人才，乃邀我进省府，当时我办事完全抱司法官本色，以实事求是精神，凡有控案，总是将所有材料逐款审查，以公正态度签署意见，送秘书长取决，可是经常案卷一上去就无下文，使我莫名其妙，直到后来才知道李立民与阮毅成有矛盾，李要把下放县长之权拿到秘书处来，利用控告问题以达其目的，要办控案须有懂法律之人，所以才找我进去。但我对行政工作是外行，省府迁到云和后就辞职，回天台法院工作。

二、1942年夏局势紧张，省府忽然要迁往松阳，以事出骤然，组织工作没有做好，方岩车辆不多，弄得人心惶惶，束手无策，只有各自设法撤退，我将70老母寄养

在附近农村，我妻携带子女与我分开，各自挤上汽车离开方岩，有挤不上者只好步行，狼狈情形不堪设想。回忆日寇暴行，至今不忘，今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各处举行纪念，意义深远而必要，我极表赞同。

三、我在工作中对处理温州专员章宝琛呈请批准处决汉奸吴百亨一案，深有感想，据章宝琛呈文所称，吴百亨是汉奸，但从送来的案卷内，吴百亨仅仅欢迎过日寇，并无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等其他罪行，我认为他创办西山瓷器厂、炼乳厂，是个浙江少有的实业家，我们应该保护，在当时日寇那种声势之下，不能以欢迎过敌人，就作汉奸处决，所以我心中犹豫，将公事暂搁未办，不久中央委员来电营救，吴百亨免受这场灾难，从这件事说明章宝琛之专横武断，草菅人命。

黄昌元

记忆到的几件事

我在方岩省府秘书处时

四、我在方岩期间，闻有共产党重要人员，被省党部中统特务陈某捕押在方岩车站附近房屋内，当时不知其姓名，亦未见其人，解放后，我在省人民法院充审判员时，从案卷中才知道是浙江地下党省委书记刘英，是被党内叛徒出卖后在温州被捕的。

1985年10月20日

(上接第7页)的教训，重视各项防备和措施，我从旁看顾、黄两人的表情，虽然都很正常，但是否毫无芥蒂，就很难讲了。

1941年下半年，方岩一时似乎恢复正常，我就于那年冬季离开方岩到淳安去了。以后没有机会再去过，浙江省政府又在方岩停留到次年夏初，才完全播迁到浙南云和县去。

浙江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

在永康下园朱召开的五次会议的一些情况

以道整理

一、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在永康成立前后

浙江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于1939年在战时省会永康成立。

黄绍竑第一次担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是1934年12月至1936年11月，但在C、C、黄埔及豪绅三大地方势力的掣肘下为期不到两年就调任湖北。1937年12月，南京、杭州沦陷前夕，朱家骅卸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奔往武汉，黄绍竑重来主浙，12月24日杭州沦陷，当时省级机关均已逃到金华。1938年2月黄绍竑决定浙江临时省会迁到永康方岩，满冀从此“永享康宁”。方岩，是风景优美的名胜古迹所在，有许多阔广的岩洞，可以躲避空袭，大小官员大部份拥挤在五峰书院、岩下街旅馆民房里，小部份住在永康城里，从方岩到世雅，临时修筑了公路，御接永(康)东(阳)公路，以维交通。

黄绍竑在来浙前，周恩来同志跟他谈过话，做过团结抗日的工作。黄绍竑后来说，他在太原时与周恩来同志的会见“是

一次难忘的谈话”，说他从这次谈话中得到了启发和鼓励，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新的认识。因此，黄绍竑第二次来浙主政就提出“刷新浙江政治，动员全省人民抗战”、“建设浙东，收复浙西”的口号，深合民众的期望，并在我地下党同志协助下，拟定了“浙江战时政治纲领”。1938年2月中旬，在永康县立中学召开第一次“全省士绅会议”，与会人员主要是各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委（即后来的书记长）、县商会理事长等，他企图通过这次会议，与全省掌握基层实权的“士绅”建立起感情上的联系，以加强他的统治地位；他还亲自跑到兰溪，组织流亡知识青年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并迅速推广到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工作。黄绍竑为了掌握一定的军事实力，多方搜罗人力资源组织“抗日自卫总队”，自兼总司令；并在丽水大港头建立“兵工厂”，制造兵器；对食盐、火柴、卷烟等实行公卖，收取“《抗卫捐》”，大抓财政收入。黄绍竑为了制造舆论，撇开当时掌握在CC手里的“东南日报”和“《正报》”两家大报，找在浙江文化界有一定威望的进步人士严北溟主

持创办《浙江日报》，在永康岭张村，盖起几排平房，办起了一张对开大报。可是，即使在大敌当前的困难时期，国民党党棍、特务、豪绅，为了维护和扩大其自身利益，在他们上峰的幕后指使下，毫不放松对黄绍竑的倾轧和斗争。黄绍竑是桂系政客，并不是一个“好吃的果子”，他运用自己“久经锻炼”的政治手腕，沉着应付，进行宠络、分化、包庇、纵容，甚至不惜相互勾结。

1938年9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并规定浙江省临时参议会组成名额为40名。参议员先由省党、政双方提名，经党、政联席会议通过，报行政院核转国民党中央党政委员会批准，再交行政院发表，并发给“选派状”。按照国民党的官制、官规，凡是“官”，即由政府发给“委派状”，凡是“议员”，即由政府发给“当选证书”。而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所发给的既不是“委派状”，也不是“当选证书”，而名之曰“选派状”。这就说明省临时参议会非官、非民、亦官、亦民，介于“选”、“派”之间，这本身就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却美其名为曰“全省最高民意机关”。

193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派徐东藩为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1939年3月，指定徐青甫、陈纪怀为正、副议长，并公布了参议员名单，按其所代表的势力来说，大体上是：

属于旧官僚、大地主者：徐青甫、余绍宋、陈纪怀、朱献文、徐东藩、叶焕华、金鸣盛、赵舒等；

属于金融财阀、资本家者：金润泉、张忍甫等；

属于CC的浙东派者、方青儒、吴望

极、陈文、刘湘女、金旋、方镇华、朱苴英、郑惠卿等；

属于CC的浙西派者：徐浩、金越光、周仰松等；

此外还有政府方面的派系人物黄人望、褚寿康、黎沛华、吴国昌等。

所谓代表浙江全省民意机关的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集各种“民众团体”反动势力之大成，在永康孔庙大成殿中宣告成立。

二. 在永康下园朱召开的五次会议的情况

第一次会议：

浙江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于1939年4月18日在永康县政府大礼堂（破旧不堪，县长朱惠清把它改建为参议会会场，因在市中心，为敌机轰炸目标）仅开成立会一次，以后会议均在城郊西津桥外之下园朱朱氏祠堂内之临时会场开会。

是日成立会，出席参议员28人，省政府出席者为主席黄绍竑，民政厅长阮毅成，财政厅长黄祖培，教育厅长许绍棣，建设厅长伍廷飏，委员朱孔阳、许蟠云。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纲以特别来宾列席，列席的还有高等法院院长郑文礼，首席检察官王秉彝，省府会计外长王探汉等。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连开十一次大会，除省府主席及各厅厅长报告外，余为讨论提案等，历时十四天，于五月十一日下午举行休会式。

第二次会议

第二次大会于1939年11月7日在永康下园朱临时会场举行，到会参议员30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纲均赴重庆开会，由省府秘书长李立民、省党部监察委员郑文礼分别代表黄、

谷致词。会议期间听取各厅厅长施政报告外，省抗日自卫总队司令部参谋长张诤文、保安处处长萧冀勉亦到会作了报告。会议至11月18日结束，19日举行闭幕典礼。

第三次会议：

1940年5月6日在永康下园朱临时议场举行第三次大会。参议员任期一年本已届满，经省府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延长一年。到会参议员32人。省政府出席者有黄绍竑、阮毅成、黄祖培、许绍棣、陆希澄、李立民，省党部郑文礼，来宾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希豪，中央赈济会代表王希隐等。会议至5月19日休会。

第四次会议：

第四次大会是在1940年11月11日在永康下园朱举行的。出席议员30人。这次会议除了听取审议省政府施政报告外，选出第二届国民参政员陈希豪、褚辅成、方青儒、胡健中四人。

第五次大会：

参议员之任期，自上次奉令延期一年以来，到1941年4月又届满，再复令延期一年。第五次大会，照章应于1941年5日举行，因4月17日敌寇侵占绍兴，宁波相继沦陷，临时参议会于四月下旬曾暂移宣平办公，六月中旬仍复迁回永康，故大会才于9月12日在永康下园朱举行。

三. 第一届省临时参议会之种种

1942年春，日寇大流窜，五月浙江省政府逃离永康，临时省会一再播迁，逃至松阳、龙泉、云和等地，几无喘息之机。国民党军队亦纷纷溃撤，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骤闻警讯，党政机关大小官员们，拉民夫、搬行李、抢物资，最后逃到了庆元、景宁、泰顺等浙南万山丛中，狼

狈不堪，省临时参议会一时亦鸟兽散。迨省会迁至云和，稍形安定后，勉强恢复了临参会的办公机构，分别与逃散各地的参议员取得联系才散而复聚，举行了一次会议，直到1943年进行改组为止，第一届临参会的主要活动都在永康。

临时参议会，按照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组织条例及议事规则来说，是政府的咨询机构，对政府的措施有一定的监督审议之权，但都是形式，参议会的任何决议，对政府毫无约束力。而政府要派粮、派捐，征夫、征税，为了压制人民的反抗，就以业经民意机关通过为词，加以强制执行。而临时参议会对于政府交议的这类案件没有不通过的。在开会时照例有一套规定的程序，如开幕、闭幕、提案审查、来宾惠词、省府施政报告，全是例行仪式。所以参议会只是政府假借的民意机关，是反动政府装点门面的一种组织，是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

国民党反动派系，对省临时参议会这一组织也极尽其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之能事。除了在“选派”过程中，尽量争取名额以外，还通过“党团”活动来加以控制。省临参会成立后，即组成一个以CC骨干分子为核心的半公开的秘密组织。由省党部指定参议员中的国民党员五至七人成立一个核心小组，称为“干事会”，并指定一个为书记，省党部书记长方青儒、徐浩都先后被指定为干事会的书记，吴望伋、陈文、金越光、顾达一等都曾被指定为干事。党团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国民党的各种政策措施，在临参会中能够顺利通过，在各个部门的人事安排上，要保证国民党骨干分子的优势。有关这方面的议案，在提案、审查、发言、表决中，都必须意见一致，步调统一；同时还要分头

联系拉拢其他参议员，以保证此类议案之通过。对其他参议员之言论、态度及其活动，密切加以注意。不过，如果涉及到其本身利益时，派系之间仍是互相倾轧，各不相让。对外勉强一致，对内仍是你争我夺。党团干事会的会议，一般都是秘密举行，而且亦无形式。方青儒总是强调：“我们虽是民意机关中的参议员，但我们都是国民党员，现在还没有实施宪政，还是党治的政府，临时参议会仍然是党用以训练人民行使四权的机关，并不是监督政府的机关。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产生的，省、县政府长官，是国民政府委派的，省临时参议员也是国民党中央指定的，所以不论政府还是民意机关，都是在为党做事的，都要保证党的主义和政策之贯彻。”他不但在党、团会议中这样说，就是在党、政联合纪念周中，在专员、县长会议上，也常弹这些滥调。这就充分说明了省临时参议会是为了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设的，离开了这个作用，省临参会就没有成立和存在的依据。

参议员没有官俸和实权，所以开始时热中者尚鲜，经过参议会开过几次大会，参议员可以在会上发发言，显露头角；可以向省政府各厅、处长提提询问案，摆摆姿态；可以向各机关推荐人事，培植亲信；可以卖情面、讲斤头，拉拢社会关系；可以相互夤缘吹捧，抬高自己地位。参议员虽无给职，但可以拿到川旅费，也可以配到省贸易公司的一些廉价物资。挂上了这块民意代表的招牌，就到处吃得开，兜得转。在临时参议会内权利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对驻会委员的争夺，因为驻会委员闭会期间，可以代行大会职权，每月有一石公粮可拿，还可领取交通费，还可以用驻会委员的身份，经常与政府打

交道，宴会请客也有一份，因而大家看上这个肥缺。但驻会委员有限额，又要安排一二个地方绅士在内，名额无几，因此，开一次大会，选举一次驻会委员，总要来一次争吵。至于参议员个人的提案，亦均系从本人、本地、本业之利益出发，真正为减轻人民疾苦之提案，则是绝无仅有的。

四. 省临时参议会给黄绍竑发难

自从黄绍竑公布“浙江省战时行动政治纲领”开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就不断把黄绍竑的所作所为向国民党中央发报，其中最重要的“罪名”据说是“任用左倾县长”、“借设置战时物产调整处（建设厅的机构）引用大批中共分子”、“组织政治工作队赤化青年，进行赤化宣传”等等。CC系还串通在武汉的浙东头子张强（当时他是国民党中执委），由他就近扇风点火。此外，黄绍竑在1938年4月间去武汉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期间，曾访问过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又有一次在李济琛家里，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等，这些行动当然为CC、军统等特务头子所瞩目，他们认为“黄季宽勾结中共，联络桂系，在浙江招兵买马，准备反对中央造成广西第二。”因而企图轰走黄绍竑，彻底改组浙江省政府。1938年6月间，黄绍竑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武汉发来的电报，指责浙江省政府“声名狼籍”，这份电报，无异晴天霹雳，气得黄绍竑立刻复电要求辞职，而蒋介石却又以温和的语气来电挽留，迫使他不得不亲自驰往武汉当面陈辞，蒋介石却以“耳有所闻，有所告尔”，一打一揉，一冷一热，弄得黄绍竑啼笑皆非。这正是浙江三大地方势力对黄绍竑联

合进攻所掀起的波澜。

1941年5月省临时参议会在永康下园朱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也掀起了一场“反黄大合唱”。

1940年1月下旬的一个拂晓，盘据杭州的日寇乘大雪初霁，反穿军装，以迷惑守军视线。待到寇军陆续过江发动总攻时，守军慌做一团，仓惶应战，节节溃退。1月22日，日寇侵占了萧山县城。据说担负钱塘江南岸防务的虽是黄绍竑所一手组成并领导的浙江抗敌自卫团，而负责指挥江防的却是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他有三个师的兵力驻在诸暨一带。当时这位总司令的前线指挥所设在诸暨磨山蒋鼎文家里，在萧山战事发生时，刘建绪明知省抗卫队不顶事，但不派遣自己的“得力”部队前往增援，好象这次战事完全是一个地方事件，与他所率领的“国军”并不相干。萧山沦陷，他的上级也没有对他追究什么责任，好象这位坐镇浙东的集团军总司令确是“守土无责”的。黄绍竑则认为自己仅负部队的组训、给养等后勤任务，指挥作战的责任完全在军方（指刘建绪）。当然，黄绍竑亲自组建的抗卫团，这支浙江人民的脂膏养活起来的地方武装，临阵不堪一击，自然也是不能辞其咎的。

第三次临时参议会上，一个以CC豪绅联合组成的反黄派别终于发难了。副议长余绍宋带头开炮，朱仲华问“江防失守责任谁属”？接着，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攻击，言论越来越激烈，什么“劳民伤财”、“虚糜公帑”啦，“养兵千日，失土一朝”，“扰民有余，抗敌不足”啦，等等。CC分子吴望伋、顾达一、郑惠卿等十分卖力；萧山籍参议员金润泉对故乡沦陷表示异常愤慨，连我行我素的张忍甫也积极

帮腔了；发言次数最多、态度最激烈的是赵舒（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和叶焕华（当过夏超的军事高级助手）两位老参议员，力竭声嘶地大喊大叫，到后来简直不是什么质询而是破口大骂了。坐在台上的黄绍竑，为了表现自己的“民主”风度，尽力克制感情，有时，也站起来答复几句，强调“军政”与“军令”的责任界限，而台下的一群所谓民意代表则报之以更加尖锐的责难。闹得极度紧张的时候，急得那位“头鬓须眉皆似雪”的老议长徐青甫，举起颤抖的右手，劝说议员的发言放缓和些，他似乎感到这个场面对他的老上司有些过份了。一旁坐着的临时参议会秘书陈成，是政学系头子张群的老伙计，对黄绍竑这样的遭遇，似乎也出于意料而有同情之感，两眼东张西望，显出坐立不安。会议到十二时半，议长宣布散会，才告结束。

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后，不但不足以代表民意，团结抗日，而且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的破坏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为国民党政府帮腔、高喊反共“剿匪”，“绥靖地方”。抗战不久，蒋介石即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系列措施，如“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等。不断的掀起反共反人民的高潮。在CC骨干及官僚地主控制下的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当然也是奉行惟谨，帮腔助势，无所不用其极。每次会议“剿匪”、“安民”、“绥靖地方”、“严密保甲”，这一类的议案，总是占着很大的比例。而对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呻吟于政府苛捐杂税之下，如驻军副食之摊派，自卫经费之筹措，都是榨取人民

（下接第28页）

应征，原名贵征，乳名德书，男，1887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出生于永康芝英。读了十年私塾，再进芝英培英小学读了一年，小学毕业。杭州四府公学中学肄业二年，杭州赤城公学体育专修科毕业，回永康任小学教员二年。

1911年9月参加辛亥革命，投入上海学生军，参加北伐，应征的名字就是这时改的。1912年1月，在湖北，学生军改编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第一期，1913年12月毕业。1914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1916年毕业。

1917年以后，历任少尉连附，上尉连长，少校营长、团附。1929年8月升南京总司令部少校参谋主官（参谋处长葛敬恩，司令蒋介石）。1931年5月应征在五十六师当联络参谋，该师在福建泰宁剿共，被红军一三五九军击败，被俘四千多人，缴获大炮、迫击炮、机枪、步枪四千多枝，师长刘和鼎脱逃，仅以身免。应征亦当了俘虏，经红军政治部主任袁牧平教育释放，发给两块鹰洋作为路费。释放后，应征仍回国民党军队。

1932年2月，应征在汉口“三省司令部”充中校参谋（司令蒋介石）。是时红军萧克、贺龙等部在豫鄂边界，徐向前部在安徽。“三省司令部”是专门负责围剿鄂豫皖三省共军的。1935年应征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上校参谋，十一月迁重庆，仍充原职。当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这个“委员长行营”在四川调兵遣将堵截

红军。1938年11月应征调军政部兵役署任上校视察主任（军政部长何应钦）。1940年9月调任浙江省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征募处处长，至1946年7月退役。退役后，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又委应征为浙江省政府参议。

国大其人其事 代表应征

显群

由于应征是浙江人，是蒋介石的同乡，又因他一贯“效忠”国民党，所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蒋介石、宋美龄和他在一起拍摄了许多照片。应征在浙江军管区任征募处处长期间，为国民党军队征送了三十五万多名壮丁，“成绩卓著”，国民政府蒋介石先后给他颁发了海陆空军奖章一枚忠勤勋章一枚，胜利勋章一枚。（胜利勋章在报上已公布，章未领到）。

国民党政府为了标榜“民主”，以蒙骗全国人民，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决定在1947年选举“国大代表”。”1946年12月，应征退役住在杭州，获此消息后，就去找当时任浙江省参议院副参议长的永康同乡吕公望，说：“本县国大代表只有你（指吕）可以当选。”吕公望说：“我哪要竞选国大代表？我想竞选监察委员。现已接到陈公哲的来信，他想竞选，他在永康名望不如你，最好你出来竞选。”应征说“我经济无基础。”吕公望叫他回芝英与本族商量，争取亲友帮助。吕公望又是当时浙江省选举事务所的委员，他当场表示支持应征竞选国大，并以他在永康的威望，为应征向

永康的亲友、乡、镇长等写信。

应征又去和黄绍竑商量，黄是应征保定军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又是老上级，应征任浙江省军管区征募处处长是黄绍竑当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时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调来的。黄当然积极支持应征“竞选”。当时浙江省选举事务所李×范系广西人，是黄的同乡，黄为应征向李疏通，又取得了李的支持。

应征又与在杭州的永康人特务头子陈庆尚商量，陈为了拉拢反动势力，正想在永康筹备组织“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一方面表示支持应征参加“国大”竞选，一面聘请应征当“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筹备专员，把一大包“章程”、“函件”托应征带交永康徐一藩、应仲威，请应征出面筹备组织。互为条件、互相帮助。

在杭州上层分子中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左右疏通后，浙江省选举事务所将应征作为候选人上报南京总选所，经国民党中央圈定应征为“当选人”。

于是，应征于1947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匆匆忙忙赶回永康。首先发动了芝英本族的堂伯、叔、兄、弟、亲友应永昌（当时芝英镇镇长）等，及各房管事，解决了竞选所需的经费（从应氏常产中开支）和竞选的帮办人员。接着就去拜访县长郑惠卿，郑也表示支持、并说，除了龙川乡以外，其他乡、镇都会听他的嘱咐。应征知道选票只发到乡、镇而不是发到选举人手里的，乡、镇长关系极大。所以，应征对乡、镇长、参议员等都作了“拜访”。并请帮办人员在芝英和永康城内大摆筵席、经常宴请“士绅”。但乡、镇长徐义康、卢振祺等人，认为需要他们帮忙，因而大摆架子，“金鼠”牌香烟嫌差，就供应“红金”，吃饭光酒肉不吃，还得专门炒菜，

为了竞选，应征只得忍气吞声。帮办人员还四处奔波，紧张活动，积极拉票，供应“面食”，一碗“肉丝面”投一票。

永康最初参加竞选“国大代表”的除应征外，还有陈公哲、方既平、陈理特、翁廷环、胡鸣龙、楼兴邦等六人。陈理特、翁廷环、得悉应征为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当选人”，又考虑他们自己在永康关系比较少，首先声明放弃。但陈公哲有二个人极力支持他：一个是县参议员骆俊三愿以经济补助；一个是乡长王三江，愿以武力支持。他们又联络方既平，尽量以金钱进行收买拉拢，声言如陈公哲与方既平两人都不当选时就以武力捣乱，同归于尽。应征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乃由曾任国民党军队少将炮兵团长（后曾任永康县长）姚永安出面，在公信茂摆酒三桌（经费由应征负责）邀请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金兆桂、三青团县干事长胡岩青及参议员胡爱棠等士绅饮酒，进行调停，劝陈公哲、方既平放弃，劝应征赔偿他俩竞选费用稻谷三百担。矛盾解决，皆大欢喜。帮办人员将芝英常产“贤田”卖去作了赔偿，陈公哲、方既平所拉得的选票“转让”给应征，所以应征“得票”就更多了。

应征确也为永康人办过好事，在永康家乡有较好的影响。1945年，永康部份沦陷，县政府逃到方岩，县长沈涛、兵役科长董兆耕，是有名的贪官污吏，他们借征兵之机，敲诈勒索，营私舞弊，派自卫队包围村庄，强捕乱拉，有钱贿赂的就释放，无钱的就征送，永康人民倍受荼毒。时值应征任浙江省军管区征募处处长，将强拉乱捕征送来的壮丁五百余人（其中有少数东阳、缙云人途经永康被捕的）释放回家，另外在安徽、广德、屯溪等地打铁，铸锅的永康人被当地作为壮丁捕送的也放

回，又帮助在福建浦城卖布、卖牛，被扣押的一批永康人释放回永康。所以永康家乡对应征有较好的影响，这也给应征竞选“国大代表”一个有利的因素。

应征为了竞选“国大代表”，耗费了

芝英常产七百多担稻谷，1948年4月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时投了蒋介石的票，所以，应征又当上了“宪政督导员”和“戡乱建国委员会”委员。

祭英烈 忆当年

扫墓有感

· 何 渊 ·

四十三年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和我前夫高一飞（即张贵卿烈士）同志，同时牺牲在浙江省永康县。现在我离休了，才有机会在今年清明节第一次来为烈士扫墓，重温战友之谊、夫妻之情。一别四十三载，似乎来得太迟，但先烈在九泉之下对我仍是能够理解的。

这次扫墓是我早已盼望的，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我于四月二十四日离长沙到浙江，同行的有贝海燕同志和一飞的二儿子高捷。二十五日晨到达金华车站，永康县民政局的同志来接我们。在永康休息了半天，看望了一飞在一九四二年曾托他给我送过信的程绍庭同志。

四月廿六日永康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陪同我们到方岩墓地。刘英同志和一飞同志，两位先烈的坟地并排而立。在这里只见石碑不见人，我心中悲痛难忍。在同高捷儿给刘英同志坟台献花圈时，我不能不忍住悲痛向先烈说几句内疚的话：“刘英同志：老战友、老领导，我在浙江工作时多承你的教导，今天总算从这艰苦岁月走过来了。但我这样久的时间没有来看你，请你原谅吧！”接着我们又到一飞的坟台献花圈，高捷儿跪下泣不成声，我更加悲痛：“一飞，今天我来了，我把你二儿子也带来了，你的老母亲我赡养了几年，后来交给大儿子学千奉养了，可叹的是我们的女儿在艰苦的岁月中不幸死去了，你知道我当时的悲痛吗？真对不起你，我又久不来看你，请谅解！”我欣慰地感到这两位